

Herbert R. Lottman

[美] 赫伯特·洛特曼 / 著 薛巍 / 译

左岸

从人民阵线到冷战期间的作家、艺术家和政治

THE LEFT BANK

Writers, Artists, and Politics

from the Popular Front to the Cold War



左
岸
丛
书

K815.6/23

2008

Herbert R. Lottman

[美] 赫伯特·洛特曼 / 著 薛巍 / 译

左 岸

从人民阵线到冷战期间的作家、艺术家和政治

THE LEFT BANK

Writers, Artists, and Politics

from the Popular Front to the Cold War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左岸：从人民阵线到冷战时期的作家、艺术家和政治/(美)洛特曼著；薛巍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2

ISBN 978-7-80225-429-9

I. 左… II. ①洛…②薛… III. ①作家-生平事迹-世界-现代

②艺术家-生平事迹-世界-现代 IV. K815.6 K81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7810 号

左岸：从人民阵线到冷战期间的作家、艺术家和政治

(美)赫伯特·洛特曼/著 薛巍/译

责任编辑：许 彬

装帧设计：林 涛 秦 嶷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65270477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010-65512133

读者服务：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960×1300 1/32

印 张：9.875

字 数：255 千字

版 次：2008 年 2 月第一版 2008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0 001~6 000

书 号：ISBN 978-7-80225-429-9

定 价：34.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由于这种“调查（邻国领土）的权利”，国际正义的观念开始凌驾于有利于各种民族主义的“地方利益”正义之上。由于这种权利，在调查的压力之下，国会大厦纵火案审判宣判无辜者无罪。

——安德烈·纪德（1934）

曾经去过美国或穿越过拉美的作家们（我们的同志们）一直对我们说，那些人密切关注法国发生的事情。他们对我们说，未来五十年世界政治的方向系于法国人民阵线的成败。

——让·盖埃诺（1936）

我从来没有在演讲台上叫喊过……从来都没有！我在会议上从来不用麦克风、不拉拢别人。我爱你，斯大林！我尊敬的李维诺夫！我的共产国际！……我一生从来没投过票！我没在任何宣言上签过名……为这位烈士，那位受到拷打的人……你可以放心……总是犹太人的问题，犹太人或者共济会……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1937）

左岸不在左，左岸就是左岸

——代《左岸：从人民阵线到冷战期间的
作家、艺术家和政治》中译本序

一说起“左岸”这个词，人们脑子里想到的立即就是巴黎，就是巴黎的塞纳河。左岸，就是巴黎的左岸，就是巴黎塞纳河的左岸。

究竟什么地方属于左岸呢。我记得，我以前的一篇文章中是这样写的：

所谓“左岸”、“右岸”是塞纳河流经巴黎这一独特地理景象所产生的一对地点称谓。塞纳河从东南角朝西北方向流入巴黎，然后向西流，途径市政厅、巴黎圣母院、卢浮宫等名胜，再折向西南（折弯点就在埃菲尔铁塔附近），流出巴黎市区。法国人习惯上以塞纳河的流向为正面，把河左边的区，称为“左岸”，河右边的区称为“右岸”。这样，“左岸”大致就是巴黎的南部，“右岸”则为北部和西北、东北部。^①

把“左岸”、“右岸”搞错，是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有许多人就错

^① 见《“左岸”不在左，“右岸”不在右》，载拙作《左岸书香》，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

误地认为，“左岸”就是从地图上看起来的左边，即西边，试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巴黎”的译文为例，有一段如下：“塞纳河东岸的蒙塔特区遍布咖啡馆和酒吧，是夜生活中心。有圣心教堂等著名建筑。塞纳河西岸有演兵场和埃菲尔铁塔，后者是巴黎的象征。西岸最古老部分是拉丁区，内有现为巴黎大学之一部的神学院……”其实，这里，所有的“东岸”都应该译为“右岸”，“西岸”应为“左岸”。

还是在我的那篇《“左岸”不在左，“右岸”不在右》文章中，我总结道：

在今天的巴黎，“左岸”和“右岸”之称已经脱离了简单的方位概念，而拥有了约定俗成的文化涵义：“左岸”往往是文化艺术之巴黎的象征，因为左岸有拉丁区，大学、书店、出版社、画廊云集；“右岸”往往是商业金融之巴黎的象征，因为有香榭丽舍大道，有证券交易所，大银行、大公司、写字楼林立。

在我看来，左岸始终就是巴黎知识界、出版界、文学界、大学界、艺术界的代名词。事实上，人们已经用“左岸”这个词，来泛指生活在巴黎左岸地区的知识分子。“左岸作为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活动的舞台”（《纽约客》作者纳奥米·布利文语），这一个词有了地理上和精神思想上的外延。而“左岸”一词的实质，即指为理想而奋斗的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

记得以前有一种说法，20世纪初期的巴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巴黎，是全世界文化活动的中心，而左岸，则是中心中的中心。这种说法，我认为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巴黎左岸汇聚了世界各地的文化精英，他们不同程度地领导着文化的新潮流，巴黎的知识分子，不仅有法国人，还有外国人（当年生活在这里的毕加索、斯泰

因、爱伦堡、海明威，哪一个称不上是世界级的文化伟人?)；其二，在巴黎的左岸，发生着能够代表世界文化、思想、精神主流的种种事件，左岸的知识分子不仅关心法国的问题，还关心外国的问题，不仅关心文化、哲学、艺术，还关心政治、军事、社会。总之，在这里，有重要的人，有重要的事。

谁若不相信这一点，可以来读一读这本书《左岸：从人民阵线到冷战期间的作家、艺术家和政治》。从20世纪的30年代起，到50年代的冷战开始，在这里生活的众多知识分子，无论是法国的还是外国的，便冲锋在为正义而斗争的思想战线（甚至战场）的前列。

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后，苏俄成了全世界的革命中心，但在巴黎的知识分子对这一革命的利与弊、得与失、经验与教训，似乎看得更清楚，更透彻。

20年代，这里兴起了超现实主义运动（此前还有达达主义运动），这不仅是诗歌的、文学的、艺术的革命，而且还是精神思想上的革命。布勒东等人一连写了好几篇《超现实主义宣言》，把这一运动定义为一种“革命”。

30年代，这里有左翼的人民阵线运动的兴起，甚至建立了左翼的联合政府。当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巩固起来后，巴黎左岸的许多知识分子不仅提出拥护社会主义的苏联，而且还对苏联提出善意的批评（当然后果不堪设想），纪德的《访苏归来》就是最好的例子。

1936年，西班牙内战打响，于是，声援西班牙共和派的国际活动，很多便在这里发动和举行。

1940年到1944年，德国占领期间，这里又成为了反抗运动的秘密中心之一，许多知识分子不仅出版地下刊物、小说、诗歌，鼓舞人们起来斗争，还加入秘密组织，从事武装反抗。韦科尔（Vercor）的《海的沉默》、阿拉贡的《法兰西晨号》、艾吕雅的《自由》都成为了不朽的抗战文学名著。

巴黎解放前后，这里的左中右各派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又纷纷起义，不但挫败了纳粹德国的“火烧巴黎”的计划，而且以有效的行动，接应了解放大军的进入巴黎。^①

战后，尤其是斯大林主义的专制和迷信被揭发出来后，这里又一次产生论战，左派阵营分化，人们按照自己的想法，纷纷追求自己所认定的真理。

在让-保罗·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阿尔贝·加缪等人的身体力行之下，本为哲学思潮的存在主义，在这里成为了一种“人道主义”的思想，有了“介入”和“抗争”的新内涵，鼓动人们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中来。

.....

可见：左岸从来不是象牙塔。

当然，左岸不仅仅是左派知识分子的舞台，不仅仅代表着进步的思潮。在这里积极活动着的还有中派和右派。

允许各种政治倾向的言论、行动，允许它们的自由表达，这是法国的特点，更是左岸的特点。在这里，左派和右派，或者不如更确切地说，从极左派、左派、中间派，到右派和极右派，这里什么样的言论都有。这一点充分地体现了法国的言论自由的环境，以及人们对这一自由的很好运用。左岸，其实就是这一现象的最好体现。在这本书中，我们不是也见证了法兰西行动、与德合作分子的种种活动了吗？不是也见证了吕西安·勒巴泰、亨利·贝罗、莱昂·都德、路易-费迪南·塞利纳等人的“思想境界”了吗？

我并不是说，这些右翼知识分子的思想 and 言行值得赞扬，我的意思是，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跟许多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并不愿意受

^① 可参阅《巴黎烧了吗？》，拉莱·科林斯、多米尼克·拉皮埃尔著，董乐山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

各种现成思想体系的束缚，不愿意接受任何精神奴役，他们探索着自己的道路，只不过，他们走上的道路是右倾的。也正是因为思想的绝对自由，导致了这里有各种党派、各种思想倾向的存在与交锋，正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自由争论，百家争鸣。

试看一些超现实主义者的行为：多数超现实主义最开始与共产党同心同德，把共产主义作为革命的理想，纷纷加入共产党。后来，随着错综复杂形势的发展和各种内幕、真相的揭示，他们觉得，共产主义并不符合他们的自由理想，便有了纷纷退党的行动。在左岸，这样的行动应该是见怪不怪的。

在本书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午夜出版社出的每一本书上面都印着皮埃尔·莱斯居尔转入地下之前起草的宣言。“在法国仍有作家们拒绝俯首听命。他们深深地感到，思想必须得有它的表达形式。行动要依照确定无疑的思想，但更是因为，如果不允许把它表达出来，精神就会衰亡。”^①

这可能就是左岸知识分子的思想本质。

而知识分子的这种自由思想，以及这种思想的表达，不仅在面对专制的意识形态时需要，在面对战争威胁和生存危机的时候需要，而且在面对着文化本身遭遇危机的时候更需要。

如今，我们中国似乎也在面临着法国人20世纪时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别的不说，其中之一便是巴黎人在50年代所面临的一大问题：“城市规划者以牺牲文化机构和城市风景为代价来优先发展经济。汽车占据了大部分人行道，占据了以前属于咖啡馆的用来闲逛的空间。小

① 见本书《午夜出版社》一章。

酒馆、书店、工匠铺已被由繁荣和旅游业所带来的流行服装商店所代替”^①。读一读这本书，我们会对法国人在面临文化冲突时的精神状态有所理解，即便不读这本书，一个有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人），也应该思考类似的问题。

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有自己的“左岸”，有自己的“左岸”精神，不为种种的威逼利诱所屈服，勇于不懈地探索真理，勇于大胆地表达自由的思想。

“左岸”在巴黎，“左岸”也在中国，在思想者和行动者的心中！

余中先

2007年10月20日初稿

2008年元旦改定

^① 见本书《结语》。

引言

故事开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巴黎，一小群男男女女——他们并不全是法国人，大多数是作家（或者记者和时而是作家的老师）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不仅法国，整个文学界都关注左岸发出的声音和发生的事情，那是塞纳河岸边一片窄小的老房子和旧街道，作家和艺术家们在那里生活、创作。他们发表的宣言会在整个欧洲、远至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和资本主义的美国引起反响。这群人中不止一个成员曾被邀请去异国参观，去美国或者苏联。若干人曾前往希特勒的故乡德国去挑战他或者赞扬他；很多人参加了西班牙内战。两个重大的冲突让这个群体分崩离析，终结了这个故事：二战中法国被德国占领时，他们有时发起针锋相对的斗争，法国解放后，意见分歧同时也是严峻的意识形态分歧。

那时巴黎的左岸乌云蔽日，东西方之争带来了核武器的阴云。这片乌云有一个蹊跷的附带结果，它降低了左岸显赫的规模 and 影响。这个法国和别国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团体做些什么、说些什么，对文学界的其他人已经无关紧要了，因而 1930 年和 1950 年大致为这段时期划定了界限。它包括了政见知识分子的兴起和衰落。待烟雾散尽，其中很多优秀的人已经不再受到来自法国之外的关注。在那之后，当我们听闻他们大名的时候，他们卷入的都是阿尔及利亚战争、戴高乐政权

和1968年五月革命之类的国内问题。

故事很早就有两点比较明确。首先是事件中很多人物的国际影响跟他们的艺术成就是不成正比的。最早年头里积极介入的知识分子中名头最大的是安德烈·马尔罗，然而他在政治活动颠峰时期出版的书其文学价值受到了强烈质疑。他自己也承认他最自觉的介入之作、反法西斯的小说《轻蔑的时代》是一部失败之作，很多人也愿意这么说他的西班牙战争题材的小说《希望》，以及他被占题材的未竟之作。安德烈·纪德后来承认他开始介入政治之后就停笔了，他的介入作品并非他写得最好的。类似地，一些作家，就因为政治上很有煽动性，凭着不多的天分写了很久。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是一本政治史而非文学史，因此提到的很多受人崇敬的作者的作品不一定是最受崇敬的作品，而是那些不太成功却表述了一次行动、投身的一件事或者描绘了一个环境的作品。好像要想写出不朽之作，作者必须离群索居，就像写《茫茫黑夜漫游》和《催命》时的塞利纳、写《恶心》时的萨特和写《局外人》时的加缪。

其次，远离左岸的旁观者会感到很不可思议的是，那些男男女女之间相当忠诚，而意见分歧和论战本来应该将他们一劳永逸地隔开。他们上一样的学校，然后在同一所大学执教，或者在同一家杂志、同一家出版社供职，在同一个沙龙喝咖啡，在餐馆和咖啡馆里并肩而坐。他们甚至同为“极右”一起作战，直到其中一位同仁转向“极左”，纵是这样他也不会跟朋友断了联系。这种战线不明确确实令人困惑。它甚至表明投身于政治并不是认真的，尤其当这些人带着《新法兰西评论》杂志般的空想。有时候他们真的不是认真地介入政治，有时又是认真的。在很多人都介入的时候，《新法兰西评论》编辑让·波朗的言论看上去很不介入，纳粹以从事危险的抵抗活动的罪名将他逮捕，但由于他的继任者出手营救，他没像圈子里其他人那样被枪决。我们也看到老朋友之间明知会让对方被捕、被施以酷刑甚至被枪决，还是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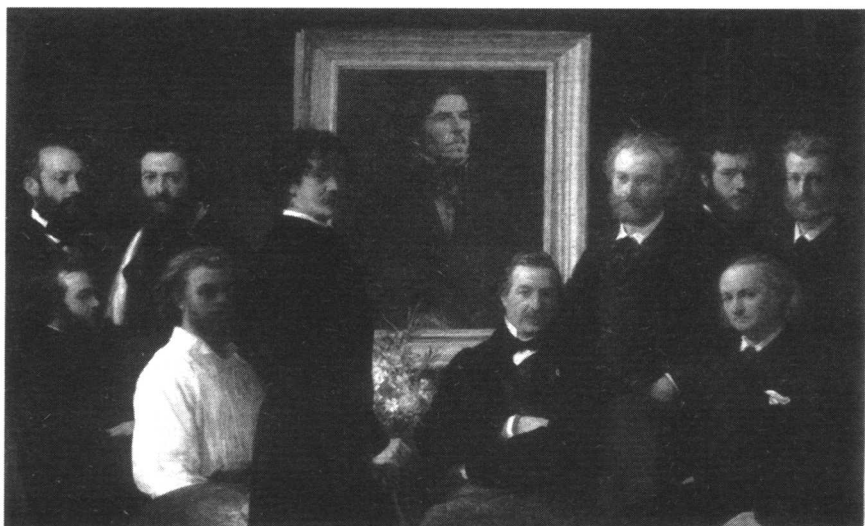
相抨击。左岸的斯大林主义最鼎盛的时候，谴责一位老朋友的不同意见会令对方失去工作或者被冷落，哪怕只是对如何画斯大林的胡子有不同意见（毕加索画的斯大林肖像引起的争论）。

本书是一部文化史而非经济史，但左岸的文学政治斗争发生于一个特殊的背景——自20世纪30年代起，长期的经济萧条影响了法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有一个背景是国际危机让人看不到任何希望，当然非集权国家不是这样，这是怀有善意的执政党和阶层无力面对和解决的危机。这种情况激发了人们对苏联实验的好奇和同情，国内共产党的力量也得到加强，莱昂·布鲁姆领导的人民阵线实行了新的经济政策。但法国还是先要经历蓄意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带来的痛苦。1935年法国一千二百五十万劳动力中有二百万人失业。从经济萧条到战败，从战败到敌人的占领，从被占到战后严酷的重建，本书所描述的历史一点也不轻松。如果说那时出版的回忆录和对那个时期的回忆中几乎很少出现物质因素，那是因为作家、艺术家和其他知识分子生活在社会的边缘。

跟左岸神话所说的相反，在左岸美国人和英国人并不多。本书中的重大事件都发生之前，一战后“迷惘的一代”史诗般的时期已经接近尾声了。“迷惘的一代”中仍住在巴黎，或者定期前往巴黎的人，像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将巴黎看作不固定的圣节，通常他们的所得要大于付出。格特鲁德·斯泰因和西尔维娅·比奇为这座被他们选择的城市贡献了艺术和文学财富，这部记载左岸文化史的著作中理应有他们的位置。但是他们没像本书的主角那样参与历史——投身于政治，并且在观念的市场上为自己的政治活动辩护。对亨利·米勒来说，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事件妨害了他在巴黎的生活和写作。20世纪30年代不多的几个对政治史做过贡献的盎格鲁-美利坚人在本书中被放到了适当的位置。

故事开始的时候，早期但不见得是更加稚嫩的时期，好像即将领

街主演的男男女女坐在一起拍了一幅群像，很像亨利·方丹-拉图尔的《为德拉克洛瓦干杯》，我们可以认出莫奈、惠斯勒、波德莱尔和其他同时代的杰出人物。这种群像确乎存在，法国文学界和政治界的名流在蓬蒂尼修道院参加夏季研讨会的时候拍了一张照片。当其时，阴云密布。



亨利·方丹-拉图尔作品：《为德拉克洛瓦干杯》（1864年）

序 幕

那几年，谁也说不准能在哪儿找到爱伦堡，他也许在莫斯科，更可能在巴黎。谁知他在哪儿，这位讽刺小说《胡里奥·胡列尼多及其门徒奇遇记》的作者。（斯大林主义横行的日子里在苏联的书店和图书馆里看不到这本书，也许苏联人家里也没有。）爱伦堡后来自己回忆说，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他在蒙帕纳斯的行为更像是出自一位年轻的诗人而不是一位严肃的作家。但是当最后一位客人离开他位于蒙帕纳斯车站后面、朝着铁路的平房寓所之后，爱伦堡将走向他那杂乱无章地堆放着书籍、绘画和他最喜欢的烟斗的书桌，为《消息报》再写一篇强硬的文章，他是这家莫斯科日报的通讯员。爱伦堡是一位美食家、蒙帕纳斯大道上圆顶咖啡馆的常客，也是一位老练的政治活动家，和他一样著名的苏联作家中没几个逃脱了 30 年代末的清洗，而他是其中之一，也是唯一的一位逃脱了清洗的犹太作家。他的同辈被关在了集中营，他却得到了斯大林奖金，直到为那段不可思议的时期编撰历史的时候他仍在世。

当他表达对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关切时，爱伦堡应该是真挚的。蒙帕纳斯附近的人像苏联记者一样警醒。1934年他陪同安德烈·马尔罗从巴黎前往莫斯科，二人参加了苏联作家大会。那年秋天回到巴黎之后，他参加了一个会议，安德烈·纪德和马尔罗坐在讲台上，听了对莫斯科大会第一手的记述。爱伦堡后来说，那天在会场的一位女性朋友对他小声耳语，说苏联和法国作家应该联手开展反法西斯运动。爱伦堡还用别人来说服他吗？不管他是如何作答的，他把这一提议报告给了莫斯科，在报告的结尾建议建立一个反法西斯作家组织。

莫斯科很快就通过苏联驻法使馆打来电话作出答复：斯大林希望亲自跟爱伦堡谈谈。因此他再次收拾行李于11月回到莫斯科。12月1日，在等待克里姆林宫召见的时候，他没有预约就径直去拜访《消息报》的总编辑。结果他好像遭到了雷击，谢尔盖·基洛夫刚刚被人暗杀了。这位政治局委员的遇害开启了历史上最血腥的屠杀——整肃、审判、流放、处死和近二十年的恐惧。很长时间之后幸存者才敢相信是斯大林本人命令暗杀其潜在对手。

那次访问，爱伦堡没有见到斯大林，斯大林正在负责调查谋杀案。爱伦堡从苏联共产党党中央那里收到了斯大林的指示：要他提交建立国际作家组织的详细计划。回到巴黎后他联系了合适的人选。他当然会联系马尔罗和纪德，他们俩都是可以指望的，他还联系了保罗·尼赞，优秀的青年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联系了保尔·瓦扬-古久里，党内联系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总负责人；还联系了苏联卓越的朋友、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欧罗巴》的主编让·盖埃诺。

1935年3月，一群作家开会拟定章程。随后国际保卫文化大会开始筹备，定于6月21日至25日在巴黎召开。每一位有良知的著名作家都受到了邀请。除法国之外，海峡对岸过来的代表也许是声望最高的，有小说家赫胥黎、福斯特和马克思主义的绅士约翰·斯特拉奇。组织者从美国叫来了一群不太知名的共产主义者和追随共产主义的思想家，

有刚刚帮助在纽约成立美国作家联盟的沃尔多·弗兰克（Waldo Frank），美国共产党《工人日报》的专栏作家迈克尔·戈尔德，德国流亡者亨利希·曼、恩斯特·托勒尔（Ernst Toller）、布莱希特、安娜·西格斯（Anner Seghers）和福伊希特万格（Feuchtwanger），奥地利的罗伯特·穆齐尔被安排发言。苏联将派去他们在世的作家中最著名的高尔基、阿列克赛·托尔斯泰（法国人会很失望地发现他跟列夫·托尔斯泰没有任何关系），当然还有爱伦堡。

法国的主队也是令人敬佩的，包括纪德、马尔罗、盖埃诺、共产主义者阿拉贡和巴比塞，还有达达运动的特里斯当·查拉、超现实主义勒内·克勒韦尔、外省生活小说家和激进社会主义政治领导人达拉第的助手安德烈·尚松。

大会正式开幕不久，安德烈·布勒东偶遇穿越蒙帕纳斯大道去买烟叶的爱伦堡。布勒东是在政治上很活跃的超现实主义者的领袖，他曾经信奉共产主义和十月革命，直到斯大林主义制度日益严重的警察政府倾向和排斥艺术实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官方教条让他感到沮丧。爱伦堡的突然出现让布勒东想起，爱伦堡在他一年前出版的一本书中攻击了布勒东的友人和他自己。爱伦堡在书中取笑超现实主义“靠继承来的财产或者妻子的陪嫁过日子，只会玩鸡奸和做梦”。爱伦堡写道，女性象征着对超现实主义的顺从；他们真的只喜欢“性交、鸡奸、恋物癖、露阴癖甚至兽奸”。至于他们的政治观：“苏联讨厌他们，因为有人在那样的国家工作。”

因此在烟店，布勒东自报家门后打了爱伦堡几个耳光，爱伦堡并没自卫，只是问到底是怎么回事。随后他知会布勒东，说他将因为攻击了一位国际作家大会的苏联官方代表而被禁止继续与会——爱伦堡认定那些用拳头决定辩论胜负的人都是法西斯。布勒东回答说，他殴打爱伦堡对苏联代表团的冒犯也不及爱伦堡在书中对他的冒犯。

马尔罗和纪德等人早料到布勒东会报复。超现实主义出言不逊